

以“自然之思”启蒙的康德哲学

莫 斌

摘要：康德晚年的历史哲学思考始终受到其自然哲人思索的牵引。在康德看来，自然之思是真理之思，也是思想启蒙的先声。理性的独立而自由的运用，是一株思想启蒙的萌芽，也是康德作为自然哲人的一片初心。康德的自然哲学并没有走向唯科学主义，而是强调了哲学、科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对立。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力所作的批判性与建构性研究，建立了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人类主体通过实践的方式在无规定性与规定性之间、规定性与自我之间、规定性与自由意志的实现之间把握住了对象之总体。判断力理论整合了自然的理论立法与自由的实践立法，以内省式的自然哲学解理性之困。

关键词：自然哲学 启蒙 判断力 理性之困

康德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家，其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思想语境中一直占据着核心位置。基于百年康德研究的时间线索以及对研究主体的分析，康德至少有三重面孔，即自然科学的“赛先生”、教化的道德哲人和社会科学化思想家，三类形象在康德学的条目下以复调的形式出现。这三类形象呈现出三种研究动态，其中，基于道德教化的“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和基于启蒙思想家与历史哲学家的康德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而作为“自然哲人”的康德则渐渐脱离了学界研究的视线。重新回到这一线索，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我们对康德思想的历史形态、当下形态与未来形态的考量，需要更加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视野，必须直面当代自然科学、当代社会科学的反思与互动，在这种反思与互动中引发新的思想争鸣。二是我们当下对康德思想的理解不能局限在西方研究的内部，我们可以在非西方的文明传统中去领会与阐释康德思想，这是康德哲学的生命力与开放性。^①

三是基于自由看自然，还是基于自然看自由，这是一个理论选择与实践谋划的问题。应对智能时代的理论疑难与现实处境，我们不能退缩到自由的内核中，仅提供乡愁的辩护，还要勇于拥抱这样一个智能时代，让自由概念的黑匣子打开。

作为自然哲人的初心

康德晚年历史哲学思考始终受其自然哲人思索的牵引。自然之思是真理之思，也是思想启蒙的先声。理性的独立而自由的运用，是一朵思想启蒙的萌芽，也是哲人的一片初心。

康德自然哲人的初心首先体现在《关于活力的真正测算的思想》(1747)一文中。22岁的康德作为初出茅庐的哲学小伙，在恭敬与执着、克制与公正之间，把“吾更爱真理”之义行诸笔端：“我相信，我有理由就我利用这几页纸对世界所作的判断而言得出一个如此之好的看法，以至我擅自批驳伟大人物们的那种冒昧，不会被解释为我的罪

^① 参见莫斌：《康德的多重面孔》，《哲学分析》2024年第6期。

过。……人的知性已经幸运地摆脱了昔日无知和惊赞所加给它的桎梏。从现在起,倘若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声望与真理的发现相悖,人们也能够敢于大胆地认为它一文不值,并且除了知性的牵引之外,不服从任何其他的劝说。”^①康德以人类知性的自由维度把笛卡尔学派、莱布尼茨学派等欧洲诸多博学鸿儒纳入了反思区间。新近的研究再次表明,在康德所处的时代,虽然“知性的自由”理念并未深入每个心灵,但康德秉持启蒙时代绝大多数思想的普遍自信——一种对人类理性的自信,以几何学为科学样板展开对确定性的追求,他从方法论上塑造了对几何学形态的信任。

一个启蒙的萌芽是理性的独立而自由的运用。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提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②这一理念的起点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是康德作为自然哲人的初心。正如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提及大自然在人类自由的演出过程所展现的“传奇”抑或“奇迹”:“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③基于一种大自然的计划,我们人类就有理由可以期待一幅令人欣慰的未来远景。

康德的初心基于德意志历史与现实的处境,使人类理性在运用上呈现张力,具体有三个方面值得分析与检视:一是虔敬主义对德意志人风土人情的品质塑造;二是从自然之书到人性之书,在达尔文生物学进化论的理论计划完成之前,欧洲大陆思想界的“理性”对如何思考人的言说与书写;三是基于数学与确定性的视角,康德如何应对经验主义休谟式问题,从而对理性重新赋能与肯定。

有丰富的历史研究表明,普鲁士个性化历程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精神格局。“德意志秉性”

作为新的基督教精神变体要被放置到虔信运动与虔信主义理念中才能获得足够的理解。^④这一表征不仅构成了康德讨论系科之争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处境,而且虔信主义通过教化的环节带来了德意志人特色的自主性与启蒙。教化与启蒙才是康德念兹在兹的要事,而这一要事获得了现实的行动载体即“研讨班”(Seminar)——以哥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意志大学发展出了“研讨班”这一现代新式教育形式。学科化与专业化促成了院系的诞生,背后是知识习得方法的思想变革。经院哲学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尝试给出方法论上的整全性,认为在求学问道上三段论的论理模式具有唯一性、普遍性与正确性。如果能合理运用此种思维方法,就能适配任何一门学问或科学。而研讨班的方法论则体现在,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理性正当且合理的运用而被理解和解释,研究领域的多样性赋予方法以多样性。这一过程也是理性自主自足运用的体现,即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新兴学科与跨学科的出现,要求研讨班依据每个学科实际提供各自的理性训练方式。从初级到高阶的理性运用,研讨班不再是重复已有的知识,原创性研究作为理性行动的实现被大力鼓励和支持。^⑤

知识的创新意味着对传统的某种革新。人是什么?人类往何处去?对这样的重大问题,康德仍然需要理性之钳拧动科学这一总开关。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之间,人类计划的奥秘从自然之书到人性之书缓缓展开,《圣经》作为科学知识的证据要素被质疑,即使现代知识体系仍无法提供一种完全替代生命宗教性内核的意义方案,但人类已然打开信任的裂隙,从生物学谱系去理解人类的进化历程。科学主义的生物学与人文学的历史主义的兴起,就是知识发展的明证。德意志用生物学的系统分类去解释世界,同时将灵魂作为精神重新概念化。人们在摸索中以一整套哲学人

①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1卷:前批判时期著作I(1747—1756)》,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②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③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8页。

④ 参见[英]彼得·沃森:《德国天才1 德意志的命运大转折 第三次文艺复兴》,张昉、孟钟捷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1—78页。

⑤ 参见[英]彼得·沃森:《德国天才1 德意志的命运大转折 第三次文艺复兴》,第83—85页。

类学方案,借用生物学的认知去替代神学意义上人的定义。虽然生命科学建立在一套与物理学不一样的原理之上,但对康德而言,科学世界与宗教世界的张力是无法避免的。基于因果关系的解释模式与基于目的论的解释模式,后者更有利于解释生物世界。^① 后文对于生物学理论演化中机械论与活力论的分析会再次回到这一理论节点。

关于外部世界(无论是物理世界还是生物世界)的认知与确定性,相关的科学史研究早已表明,为了避免人类感知外部世界所带来的不可靠性,古希腊人早已通过以几何学为代表的数学来寻求和把握内外世界的确定性。数学作为知识力量的兴起更体现出人利用理性研究自然并用数学揭示自然的本质。中世纪的科学进程虽然将自然的数学化归结到了基督教上帝的计划与行动,但保留了“以数学设计宇宙”的古代教义。16—17世纪乃至18世纪的多数数学家,把探究自然的数学规律当作一种宗教献祭的理性行动。作为有限者的人虽然无法理解宇宙创世的全部计划,但谦卑之态可以“接近”造物主的心智与世界,从而理解自然这一大写之书的本质,并获得人之生存的意义。此种谦卑的“接近”形成了另一理性主义的变种。包括数学家、物理学家在内的科学家还相信有外部世界的存在吗?我们能够既知“心”,也知“物”吗?古希腊人的思想贡献之一是引入了公理概念,刻画一种天然的不言自明的真理。从先天到先验,后到经验,再到实验,公理的抽象性与理想性,优先于明晰性,因信称义般公认了客观世界中纯数学公理的存在,并进入现代人的思想世界。^②

经验主义休谟版本的出现是为了对抗一种18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信念——数学能够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真理性认识。从数学公理与定理到自然界之奇迹,从上帝存在到外部世界的存在,

都不构成绝对真理。理性的限度在强调中被放逐,《人性论》接续了经验主义的特色。休谟特别强调,被世人称道的知识抑或体系的理论基础,在人类理性法庭面前是脆弱的,人类知性的范围和能力需要重新审视。^③

理性必须被重新赋能,必须重新戴上皇冠,必须维系住人类对于自然抑或外部世界的尊严。人是有理性的,是有自由意志的,同时,也是谦卑的,肯定自己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位置。这是康德拥有的信念与理论证明。^④ 所有的数学公理和定理都是先天综合判断。数学的可能性来自我们心灵拥有的空间和时间形式,通过保证或者说相信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真理性,也保证了先天综合判断命题的真理性与可靠性。人类不能仅依靠经验性的感知而获得关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可靠知识。人类理性的任务是通过探究人类心灵的深处,反求诸身,实现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即使19世纪非欧几何出现,外部世界在与不在的难题也不会直接消解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位置。物、感觉的可能性与确定性、记忆的持续性,共同“保证”了外部世界的存在。“科学实验”是知识可能性的保证,也是相信外部世界存在的依据。

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力作一种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研究,建立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能有效地克服独断论的教条主义及怀疑论的折中主义。这门科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纯粹理性的一些原理来论证出关于至高无上的存在体和来世的知识”。^⑤ 关于诸如“形而上学究竟是可能的吗?”的难题,“我们有确实把握能说某些纯粹先天综合知识是实有的、既定的,例如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因为这两种科学所包含的命题都是或者单独通过理性而带有无可置疑的可靠性,或者一般公认是来自经验却又独立于经验的”。^⑥ 至此,“自然之学”,关于康德哲学遗产的重要一面得以缓缓展开。

① 参见[英]彼得·沃森:《德国天才1 德意志的命运大转折 第三次文艺复兴》,第103—104、134—135、217页。

② 参见[美]M. 克莱因:《数学与知识的探求》,刘志勇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47、49页。

③ 参见[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8、79—80页。

④ 参见[美]M. 克莱因:《数学与知识的探求》,第15—17页。

⑤ [德]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8页。

⑥ [德]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31页。

以判断力之思解自然之困

关于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讨论,在探究外部世界与安顿心灵之间的理性能力运用中,有一个可靠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一直在力图通过一种相对新颖的语言背景和新的思想潜流来作本体论探究”。^①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进展,剥离了表现为“空间、时间和质量被当作无限宇宙秩序的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构成要素”,而以太则退化为古代万物有灵论的残余;当时间来到近代,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原子的世界,这些原子构成的世界按照可以表示为数学形式的定律运动着,“理智如何可能把握一个在其中没有理智作出应答或控制的无法企及的世界呢?休谟和康德最先把上帝从形而上学哲学中实际驱逐出去,通过一种怀疑论批判,他们也摧毁了当时那种对理性的形而上学能力过于自负的信任,这一点绝非偶然”。^②

诸如古代怀疑论学派的探索与思辨,一个核心要义是通过悬搁独断而获得宁静的心灵自由。这种内省式认识论的思想遗产是后世认识论领域许多重大问题的开端,某种意义上,休谟与康德是同路人,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事业,厘清束缚人类心灵的虚假观念,寻求坚实的人类认知基础,建构起人类的真理性知识体系,从而构筑人类文明的大厦。^③在没有上帝的牛顿物理学世界之中,人类知识的范围和确定性是有限定的。一种康德版本的怀疑论,对独断论前提的批判性反思是以理性推理的方式进行的,并不是以独白反对独断。

在自然认知与心灵自由之间,德国哲学家的哥白尼式的思想革命重新拟定了“我思”与“存在”的模式,综合创新了真理理论与自由理论。“真理和自由在这种行动的理性主义之中获得同

一,而正是这种理性主义规定了德国观念论”,“人类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拆解开来就是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同时人的有限性也是理性的,尽可能科学化的哲学理性引导一种科学式的形而上学,科学性即体系性,体系性即作为整全的必然性。^④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通过道德法则确立的作为自由的因果性和通过自然法则确立的作为自然机械作用的因果性,除非将与前者相关的人表象为纯粹意识中存在者本身,而将后者表象为经验意识中的现象,就不可能统一于同一个主体,即人之内。”^⑤康德在实践理性的进路中,通过对休谟经验主义温和怀疑论的“超克”,从经验中“验证”必然性,为判断“谋得”普遍性。面对怀疑主义的疑难,“因为经验主义建立在一种感觉到的必然性上面,而理性主义建立在一种领会到的必然性上面”,康德的解决方案是,“在这样一个哲学和批判的时代,很难说有人能够认真地对待这种经验主义……为了练习判断力,并且通过对比使先天理性原则的必然性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⑥判断力在自然的一种合目的性的概念中,提供了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之间的中介概念。^⑦

基于自然科学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的视野,可以从新近研究的案例反观康德自然哲学中所体现的“自然的形式合目的性的原则”。从17世纪的机械自然观到18世纪的原子论,近代科学研究所遵循的主要思想路线都力图以不变的基本物质微粒的运动来解释宏观的外部世界。^⑧比如,关于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及背后“认识的真理性确定”问题,人们能够在实验中检验的是认识结果与本体论承诺的匹配,但对于本体论承诺是否可知,则不确定。当下量子力学带来的认识论难题是,我们“能知”的是具体的概念范畴和实验模

① 参见[美]埃德温·阿瑟·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② 参见[美]埃德温·阿瑟·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第257、259页。

③ 参见肖显静:《科学思想史: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科学革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版,第171—175页。

④ 参见[法]贝尔纳·布尔乔亚:《德国古典哲学》,邓刚译,高宣扬校,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2、66页。

⑤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

⑥ 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1、12页。

⑦ 参见[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⑧ 参见肖显静:《科学思想史: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科学革命》,第109页。

块,而“不可知”或“未知”的则是“事物本身是什么”。对于康德而言,先天综合判断背后的本体论承诺抑或原哲学命题,超出了人类认知的极限而显出人类的漠不关心。^①另一则是关于活力论与机械论的讨论。活力论的提出奠基于生命世界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类似“人”这种生物的特殊性是无法直接与石头、树木等物质直接等同的。牛顿物理学所带来的具有支配性的机械论方法,无法“认知”生命物质背后的活力(即某种生命力)。所以即使机械自然观在西方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带有亚里士多德色彩的“预成论”和“渐成论”仍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生物学的发展:生物有机体的各个生理部分在发育之初就以较小的形式存在;生物有机体在存在之初亦呈现为尚未分化的物质,经过发育而生长出新的部分。康德关于生物目的论的思想推动了活力论观念在德意志的流行。康德将有组织的生命视为“自然目的”,“自然目的”的自组织性呈现出因与果的统一以及整体与部分的综合统一。^②

仅基于自然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的视野仍无法完全理解康德或者康德式的处境。生命之力无法脱离物,生命之力亦无法完全还原为物理解释。特殊的、经验性的自然法则对人的见识来说仍是偶然性的,在把这种偶然性的杂多结合成为经验时,仍然包含着一种对我们来说虽无法探究但可以思维的合法则的统一性。

《判断力批判》在审美判断和自然目的论科学上统摄了康德的理性主义。一种审美判断激发人们将自然“判断”为合乎目的,即自然将某种知性当作原则,并依据一种有序的大全观念将纯粹自然的机械论统一起来。^③知性立法(自然)与理性立法(自由)通过判断力而联结。真正的知性包含着先天的建构性原则,“它应当通过一般地如此称谓的纯粹理性批判而针对其余一切追求者

来确保他自己独占的财产。……在我们的认识能力的秩序中、在知性和理性之间构成一个中介环节的判断力”。^④判断力整合了自然的理论立法与自由的实践立法,人类主体通过实践的方式,在无规定性与规定性之间、规定性与自我之间、规定性与自由意志的实现之间把握住了对象之总体。“知性对于作为感官客体的自然是先天地立法的,以达到在一种可能的经验中对自然的理论知识。理性对于作为主体中的超感性东西的自由及其固有因果性是先天地立法的,以达到一种无条件实践的知识。”^⑤

以内省式的自然哲学解理性之困

“自然”是康德哲学遗产的重要一面。以自由与启蒙作为康德的标签词,常常会引发学界关注。而自由与启蒙的历史性,嵌入欧洲文明的叙事,也同时在自然科学的叙事中。这种叙事在当代人看来有一基本处境。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欧洲的文明连续性的叙事,这种19世纪以来欧洲学术界构造的神话夸大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近代西欧或大西洋文明之间的连续性和共通性,通过对欧洲特性的构建,进而将现代发展起来的欧洲特性描述成西方的普遍性特征。^⑥我们把这种情形看作理性之困的表征,以下对康德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考察,即从一个侧面去回看理性之困。

贝尔纳·布尔乔亚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有一个比较精巧的定位,也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通过哲学的普遍性使命建构起包括所有人的普遍规定性(即“人是什么”的问题),虽然这种向上普遍性带有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特殊。德国古典哲学是哲学首次对自身加以反思,并建构一种关于人的普遍话语。这种话语扎根于德意志特殊的文化背景,又努力向上升华为一种对人性的普遍性论述与反思。这种自我肯定的积极向度,一直在试

① 参见肖显静:《科学思想史: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科学革命》,第513页。

② 参见肖显静:《科学思想史: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科学革命》,第516—520页。

③ 参见[法]贝尔纳·布尔乔亚:《德国古典哲学》,第83页。

④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第177页。

⑤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第204页。

⑥ 参见韩震:《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地中海文明属性——关于欧洲文明连续性神话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图避免西方思想自苏格拉底以来就存在的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困于自然之中,亦困于理性之中。“一切本义上的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辩的确定性。”^①法国思想家维耶曼关于康德自然哲学的论述,对其中的思想张力进行了重构和反思。维耶曼聚焦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在黑格尔眼中康德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具有二重性。在维耶曼看来,“道德意识之所以是哥白尼式体系的拱顶石,就在于它完美表现了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统一”,“自由和存在之同一以及通过这种同一实现的主体和客体之同一的意义,它支配着整个哥白尼式革命”。^②然而,康德理论大厦的复合结构从起源上就缺乏一贯性。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式的生存论看来,在包括辩证论、分析论与感性论的三种主干下面,“无限与有限的替代在生存和以时间性为基础的有限性的形而上学中消失不见了;从先验时间中涌现出了存在”。^③

维耶曼的批评至少有另外两种思路值得探索。其中之一,不是朝向后康德主义或者新康德主义,而是返回到雅克布·波墨,即以波墨的自然主义方案带来的视角,统摄自康德到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之辩证,具体的案例就是上述提及的活力论与机械论。通过内在精神的自由意志,以内省式的自然哲学解理性之困。

德国自然哲学的重要特点是心灵的内省,对人的心灵的主动性感兴趣。既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类似自由意志的东西,又感受有某种限制和平衡这种自由意志的力量。自然界同样为精神所渗透,所以自然之过程不应当用纯粹外在的、机械的物质运动来解释。这是德意志思想中区别于18世纪法国哲学家们“人是机器”观念的底色。基于这种底色,雅克布·波墨系统提出了德国人关于自然界变化发展的辩证过程。人是宇宙的具体

而微的翻版,人是由人的内部精神力量支撑着的。外部的世界、自然界也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同样由宇宙的灵魂抑或自然界精神之上帝所支持。在世界的太初,自然界的精神即上帝,是万有也是无有,因为任何与之对立的東西,上帝都能通过它显现自己。作为宇宙精神的上帝产生一种倾向于自我显示的离心欲望,同时又产生了有意识地控制自我的向心意志。在矛盾中,向心意志制服并同一化离心欲望。这种矛盾的精神形象的外化,就成为自然界。“没有自然界,上帝就是一种神秘,因为没有自然界就是无,亦即永恒的慧眼……我们从还不存在自然界的神秘中可以理解到原始意志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永恒的慧眼为了显现自我而趋向自然界,另一种形式是从这第一种形式产生的,就是追求德行和力量的欲望。……而这个看得见的、可理解的世界,其外在性质就是内在精神的显现或内在精神的外化。”宇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宇宙精神是在人的思想中充分体现的,而人类理性的逻辑推理活动也反映自然的发展。宇宙精神本身就是有与无并存,有即无。在体现自我的欲望出现之时,也同时出现抑制这种欲望的自主的意志,相反相成。对立两极的矛盾斗争,产生了运动、发展和自然界。趋向于个体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和趋向于普遍化的、以外界为中心的原则相对立。宇宙精神是自主的并由其自身决定的,它是一个包括世界在内的整体。^④

“有机体的生命阶梯”是另外一条线索。从笛卡尔开始,一种机械世界与精神世界两个平行侧面的二元论就构成欧洲人的思想底色。自然界按照一定等级排列构成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世界观,在笛卡尔体系内被替换为动植物、无机物以及人体,都是由自然规律和机械力所支配的。世间万物在合目的性与计划性中形成的一条巨大的存在链条,在人类发现与建构的自然规律中解体了。与之相对应,科学革命和新教徒改革形成复调。

① [德]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 参见[法]朱尔·维耶曼:《康德的遗产与哥白尼式革命:费希特、柯恩、海德格尔》,安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③ 参见[法]朱尔·维耶曼:《康德的遗产与哥白尼式革命:费希特、柯恩、海德格尔》,第16页。

④ 参见[美]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7—334页。原书把波墨译为“伯麦”。

中世纪由神学与自然哲学密切配合而构成的世界观也在科学家的理性世界中逐渐瓦解。在近代欧洲大科学家中,新教徒数量所占比例高于天主教徒。新教徒不仅认为内心的虔诚能够使人类得救,而且认为从事对人类有益之事亦可视为对今世生活的肯定。研究自然之书被视为一名基督徒的责任,从加尔文到蒙田、从哥白尼到开普勒,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研究就是质疑宇宙间实体背后的等级观念,并提出多世界学说。人类在眺望星空之时,也在努力地想象是否有生物居住在行星那头。“我们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各种生物则以最初被创造出来的形式永远地固定了下来。各种事物间存在着最大的多样性并形成一条连续的存在链条。生物按分类原则以组织与结构保持着动植物的链接。新教的科学与神学的联盟,在19世纪的进化论面前终结。分类可以接续等级,但作为环节的结构的连续性链条断开了裂隙。^①

结 语

应对智能时代的思想挑战,不能退缩到自由的内核中,提供乡愁的辩护,而是要勇于拥抱这个智能时代。让自由概念的黑匣子打开,基于自由看自然,还是基于自然看自由,这是一个理论选择的问题。通过对康德作为自然哲人的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康德的自然科学之思考、判断力与自然的合目的性以及自然之思对理性之困的解决方式,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大有裨益。康德的自然科学并没有走向唯科学主义,而是强调了哲学、科学和文化

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对立。

康德的思想遗产及其面临的挑战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表征世界;其二,把科学视为文化的重要因素。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这个所谓‘真实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我们自己的(空间—时间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这种建构起来的构成之物,需要新的理论指引去探索。“哲学已不再能与专门科学并列地作出关于实在的有牢固基础的、能加以论证的陈述了。它必须返回到逻辑学、科学理论和基础研究领域中去”,“现代公理论的产生、建立数学逻辑基础的尝试、逻辑悖论的发现和对于把数学运算限制于构成的思想(das konstruktive Denken)的要求”。^②理性的思想实验就是,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范例进行一场形而上学的完全革命来改变形而上学迄今的处理方式。“理性必须在其一切活动中都把自己置于批判之下,而且理性不能在不损害自身和不引起一种不利于它的嫌疑的情况之下通过任何禁令破坏这种批判的自由。”^③康德通过理性能力的批判与建构,重新赋能人类理性。同时,康德的启蒙理念建基于理性的独立和自由运用,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哲学思考之中。

作者简介:莫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部副编审。

〔责任编辑:焦德明〕

① 参见[美]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第158—159、163—164、175—176页。

② 参见[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19、23页。

③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9页。